

20世纪 中国文学与传统政治文化

王俊峰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20世纪
中国文学与传统政治文化

王俊峰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政治文化 / 王俊峰著.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311-04916-4

I. ①2… II. ①王… III. ①政治文化—影响—中国文学—研究—20世纪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0387号

策划编辑 张爱民
责任编辑 王淑燕
封面设计 周晓萍

书 名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政治文化
作 者	王俊峰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22千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916-4
定 价	36.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序

程金城

看到王俊峰君这本书的初稿,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了;认识王俊峰则要更早。十多年前,俊峰曾在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我主讲“鲁迅研究”,从此开始了我和他的师生情缘;后来俊峰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选我做他的指导教师,他内向而诚实的性格和对学术的认真执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因外语未达到录取线而未被录取,他回到陇南教育学院(陇南师专继续教育中心)继续当教师。之后几年,我们虽然断断续续还有联系,交往却比较有限。直到几年前,他给我发来了他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政治文化关系的学术著作文稿,让我给出版社推荐。读过书稿之后,我才知道俊峰读博虽未能如愿,做学问却从未停止,他完成的30多万字的书稿超出了我的预料,达到的深广度不亚于专业学者。可以想见,在一个没有学术研究要求和学术绩效评价的基层学校,在没有任何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政治文化这样一个大问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和承受多少压力,要有怎样的毅力和学术勇气!我相信,这部著作,不仅浸透着俊峰十几年的心血和汗水,也蕴含着他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追求,当然也寄托着他的学术理想。我推想,依他的性格,他可能在一二年间就干了这一件大事,一件在别人眼里的“傻子”干的“傻事”。与动辄几万、几十万经费资助的大项目相比,我感触良多,也有点不平,当然也满怀希望,于是建议他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我的两位同事古世仓教授、彭岚嘉教授和我一起推荐,兰州大学出版社也为此做过积极努力。但是折腾了差不多两年却没有结果。为此我很歉疚,觉得可能出了不好的点子。但是,我始终在鼓励俊峰听取各方意见,不断修改完善,因为我相信它的学术价值。今天,它终于付梓出版,我由衷高兴,俊峰让我作序,我觉得义不容辞。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政治文化关系研究,乍一看,似乎是一个“老问题”,因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说远一点,自有文学和政治存在,就是一对始终相互纠结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尤其如此,所谓“文以载道”,多半与此相关。说近一点,从中国文学孕育现代转型,到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纠缠在很多时候白热化,其中的教训异常深刻,也因此形成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拨

乱反正”开始,几代学人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从这个角度说,这似乎是一个老问题。这个老问题也因时代的变化,人们对此的学术态度由热趋凉,使之显得不但“老旧”,而且似乎“过时”。但是,细细思量,俊峰研究的又是新问题。这新,窃以为有这样两点:一是联系“传统”看现代,即从古今相通的视角切入,不仅仅是现代政治与20世纪文学的关系,而是传统政治与20世纪文学的关系;二是突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不单是“政治”本身,而是将政治作为一种“文化”审视,这就不仅涉及政治的制度层面,而且主要涉及精神文化层面。这样一个命题的多重含义及其相互裹缠,决定了研究的难度。而俊峰其所以敢于研究这样一个难题,并不是他的固执和学术视野的局限,恰恰是他看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增长点。他认为以往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尚存在重要盲点,“有些学者深入揭示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有些学者则以政治文化的独特视角来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的演变和发展。但比较而言,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系统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迄今鲜有这方面的著作问世”。我想,这一视角的意义在于他把一个重要问题凸显了出来,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旧制度的推翻与新制度的建立作为显性的历史“事件”,影响到文学的变化,这是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的;但是,传统政治文化,或者说政治在精神文化层面形成的稳定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等等的影 响一直存在,作用巨大,却不被研究者充分注意,或者有所意识却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俊峰的这本著作,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了一个新的逻辑起点,由此展开他的系统思考。“笔者着眼于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探寻传统政治文化和由此而生发的观念、意识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契合点和内在联系,从作家的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文学的主体意识和叙事模式等方面,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在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受传统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的实际情状,揭示中国文学在现代性建构中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背景和接近本质的鲜明特征,试图得出比之选取其他视角的研究有所不同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空间和领域有新的拓展”。他有这样的认识,并且很认真地按照这一思路深入探讨,其结果就在书中,无须我再重复,读者自有判断。我所要说的是我的阅读体会:这是一本厚重的有学术含量的著作,除了上述选题的创新和切入角度的新颖之外,其优点还有,第一,学术态度严肃和严谨,紧扣主题,一丝不苟,层层深入阐释,这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中,难能可贵;第二,论证充分,思维开阔,充满逻辑力量;第三,理论阐释与文学现象分析和作品解读紧密结合,言之有物,在大家熟知的现象中多有新的发现和新颖阐释。

我特别想说的是,这样一个大的研究命题,其论证过程,包括语言表述及叙述方式的把握,都是有相当难度的。俊峰为了充分阐释自己的观点和突出主旨,难免会因强调某些现象而在客观上忽略另外一些重要现象及其意义,比如,本书着眼点在于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亦即着重揭示的是二者的深层关联性,这在客观上就有如何同时

照应 20 世纪文学“反传统”(包括反传统政治文化)的问题。类似的难度也反映在具体的论述中,所以,虽尽可能客观、科学,却也不能万无一失,可以提出反问之处也不能完全避免。当然,传统政治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话题,不是一本书所能穷尽的,也不是一时所能说清的,它依然需要新的史料的发现和继续调整研究视角,须要不断思考和不断深化研究水平。王俊峰作为名不见经传却持之有恒的学者,他的研究是令人钦佩的;本书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反映了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成果,是值得嘉许的。我们期待学人共同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新阶段。

2016 年 1 月 27 日于兰州

目 录

导论 传统政治文化视域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1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概说	2
二、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政治文化结缘	8
三、传统政治文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影响的方式与特点	15
四、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政治文化关系研究的基本思路	20
第一章 20世纪中国作家报国济民的价值取向与 传统伦理政治观	29
一、伦理政治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	29
二、“三不朽”的文化人格:五四作家人格精神之一种	34
三、革命者、战士:20世纪中国作家的特异风采	40
四、报国济民: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思想价值	61
第二章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与 “大一统”的政治国家观念	88
一、“大一统”的政治国家观念:传统经学的政治思维定式	88
二、民族国家意识的高扬:20世纪中国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92
三、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冲突: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重要生成背景	99
四、“统一意志”:新中国文学与生俱来的话题	115
第三章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家国叙事的流变与 “家国同构”的宗法政治模式	160
一、“家国同构”:传统中国社会特有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模式	160
二、“出走”与“回家”:挽救民族国家危亡的艰难选择	163

三、家族文化的放逐：“新中国”政治远景的建构·····	174
四、家族文化的回归：全新的现代性社会文化设计的重新启动·····	181
第四章 现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	
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理想 ·····	196
一、民本、平权思想与大同意识：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理想 ·····	196
二、“以欧化为是”：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发展态势·····	198
三、“以俄为师”：现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202
四、从“革命文学”到共和国文学：马克思主义光辉烛照下的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存在形态 ·····	209
主要参考文献 ·····	250
后记 ·····	255

导论 传统政治文化视域中的 20世纪中国文学

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种种突破性、创新性研究中,不少当代学人曾不约而同地将思考 and 关注重心转向“寻根”路向,他们立足于宏阔的文化视域,探寻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和表现形态,梳理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发展脉络,在“文化的世界”(或“语境”)中思考和阐释新旧嬗替的大时代背景下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复杂过程,文化研究一度成为引人注目的学术思潮。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研究,充分显示了研究者研究视域的极大拓展和对研究对象独特性的准确把握,同时,蔚为风潮的文化研究也有其复杂的文化意义:“一方面,它是文学批评走向文化评论的必然(发展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评论决不仅仅意味着生搬硬套西方的文化评论体系。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显然不可能有当代中国文化评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是90年代的中国学者努力在全球化进程中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的一个象征”^[1]。

显然,学术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有些学者深入揭示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有些学者则以政治文化的独特视角来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的演变和发展。所有这些无疑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带来新突破的契机,并展示出诱人的发展前景。但比较而言,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系统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迄今鲜有这方面的著作问世。

笔者认为,文学与政治文化结缘是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必然会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得以沉淀、延续、发展。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的精神活动,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核中一定流注着民族传统政治文化充盈的血液和精气,在内容和形式上一定烙刻着民族传统政治文化鲜明的印痕和标识。“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2]，“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即永久保有某种特质),又是‘历史的’(即经过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3]，“一种文学,之所以可以区分为这一民族或那一民族的,关键在于其不同的民族风格,而决定这种民族风格的关键,则在于不同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的文学正是以自己民族独具的文化精神为灵魂,为内在的生命”^[4]。

基于此,本课题研究拟就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政治文化和由此而生发的观念、意识的关系问题做一简略的概括性的梳理和观照,力求揭示中国文学在现代性建构中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背景和接近本质的鲜明特征。试图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以再认识。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概说

据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的研究,属于“独立起源的文明”或第一代文明的,全世界共有九个,他们分别是: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印度、爱琴-米诺斯、南俄、美洲的奥尔梅克、玛雅、查文^[5]。

中国作为“独立起源”而又经久不衰的文明发源地,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在远古时期,中国文明就与埃及、巴比伦(两河流域)、印度文明并驾齐驱。在中古时期,则屹立于东方,与西方的在爱琴-米诺斯文明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希腊罗马文化交相辉映。欧洲自中古以后,进入历史上所称的黑暗时代,而中国文化在漫长的中世纪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从传说中的黄帝以来,迄今已约4650余年,以古本《竹书纪年》所载的夏代为始,迄今约3700余年,据《尚书·尧典》则可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据甲骨文则始于公元前1200年,据《诗》三百篇则始于公元前1100年。从周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以下,便明白有年可稽。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以下,则明白有月日可详。在中国最早的历史文选上古之书——《尚书》中,记载了3000年前的政治档案,足与两河流域早期的定居民族苏美尔人的泥版文字比美。2700年前的《春秋》以事系年的编年体例,是世界史上的空前创造。书中所载日食37次,有33次均属可靠。其中最早一次,即鲁隐公元年春壬三月己巳日,日有食之,约当公元前720年2月22日,比古希腊泰利斯所说日食早135年^[6]。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还并不仅仅限于中国本土,中国文字、典章制度及哲学、宗教、科技、文学艺术广泛传播于周边国家,形成具有共同文化要素的中国文化圈。这个文化圈,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东方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并称世界五大文化圈^[7]。

近代以来,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竞争中显得落后,但中国文明形态作为一种思维结构与生活方式在文化层面上的意义不会就此消失。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文化都曾经、正在和将要为丰富发展人类文明做出独特贡献。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杜维明指出:“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文明类型,有的是有古无今,如古埃及文化以及巴比伦文化;有的是有今无古,如美国文化和俄国文化;有古又有今的,以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以及广义的西欧文化三支最为显著。”^[8]所以说,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以其非凡的创造力给人类留下了历史悠久、成就辉煌的文化遗产,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化宝库,业已成为世人瞩目的“东方之谜”。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它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经过不断沉淀、延续、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是伴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而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政治文化”一词,是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时首先创用并加以界定的。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解,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也不同于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是作为一种心理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评价和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在阿尔蒙德的观念中是属于“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指涉着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价的主观取向。自从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以来,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政治学者纷纷采用这一概念来解释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行为及其变迁的趋向。当然,在具体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时,不同学者在理解上多少是有差异的。1958年,比尔(Samuel H. Beer)和鄂曼(Adam Ulam)在《政府的模式:欧洲主要政治体系》一书中所讲的“政治文化”,主要包括政治价值、信仰体系、感情态度与符号。1963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尤劳(Heinz Eulan)在其《政治学行为派》一书中肯定了“政治文化”概念的价值,认为它可以促进政治行为的研究,以比较不同文化体系或同一文化体系内“各次级文化”间的异同。1965年,白鲁恂(Lucian W. Pye)与弗巴(S. Verba)合编了《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一书,白鲁恂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一套态度、信仰与感情,此种态度、信仰与感情使政治过程有秩序及意义,同时为政治体系设下了基本前提与规则,以求控制体系中的行为。”而弗巴则认为:“政治文化是由包括经验性的信仰、表达的符号以及价值判断三者所交织的体系。它划定政治行为发生的背景,是政治活动的主观取向,包括一个政治体系的最高远的理想以及一般的行为规范。”1966年,阿尔蒙德与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 Jr)合作发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政策》一书,该书对“政治文化”的内涵和定义做了进一步阐发和界定,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形成于本民族的历史以及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之中。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法律的反应。”上述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种种阐释,包含着不同的研究者自身对此的理解以及标明了他们各自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9]。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界、历史学界、文化界的许多学者也对“政治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如钟明善等认为:“政治文化是社会系统中一般文化的一部分,它是指政治系统中各类政治角色的政治倾向和态度类型的总和,即政治系统中各类政治角色对政治系统和政治活动的认识、态度和情感。从政治文化的结构看,政治文化是一个以政治认识为核心、以政治情感为形式、以政治价值为内容、以政治理想为灵魂的有机整体。”^[10]金太军等借鉴阿尔蒙德的观点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间内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和感情的总和,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具体地说,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政治认知性成分,即一定社会中的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识和意识。它是政治文化中的理性成分。(2)政治

情感性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感情、态度,包括热爱、忠诚、怀疑、疏远等情绪。(3)政治评价性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价值判断、意见。”^[11]王沪宁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包括了社会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具体地说,包括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尹学朋等认为,“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在政治社会化过程所持的政治态度、情感、评价等方面的综合倾向,体现民族国家政治变迁的内在思想轨迹。”^[12]朱晓进等认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体。而狭义的政治文化则主要是指由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也就是阿尔蒙德所谓的‘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13]

显然,“政治文化”已成为一个相对宽泛的学术领域和研究课题,研究者见仁见智,在此我们无意于对它做进一步具体的阐释甚至研究,但以下结论或许是大多研究者可以认同和接受的,我们也基于这样的理解来使用这一概念。

(1)政治文化是“文化体系”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方面,它构成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包含着社会成员在政治系统和政治活动中的认知、情感、态度、评价等观念形态体系,在潜移默化中,有时甚至在试图超越、极力拒斥中潜隐地支配着社会成员的政治心态、政治评价和政治行为。

(2)政治文化被社会成员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往往与特定时期的文化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政治文化的运行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映现民族国家历史演进、政治变迁的内在精神和思想轨迹。

(3)民族、国家、阶级、集团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出于某种政治意图和实际需要所建构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规范等,逐渐被社会成员产生认同感,最终形成政治文化,这也是政治文化最主要的构成。

(4)政治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过,这个稳定性是相对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政治文化也要发展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政治文化。

(二)传统

在汉语中,“传统”的初始含义指帝业、学说等的世代相传。如《后汉书·倭传》记载:“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上》指出:“儒主传统翼教,而硕士名贤之训附之。”后来引申为风俗、道德、思想、作风、艺术、制度,等等,凡是世代传承的,都是传统。与汉语“传统”这个词对应的拉丁文是 *traditum*,英文是 *tradition*,意思都是从过去延传到现今的事物,或者因袭的惯例^[14]。我们可以理解:传统是指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积淀并沿传下来的,体现人的共同

体本质特征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系。它一般都存在于人们意识的、生活的结构之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渗透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风俗、作风、艺术、审美、情趣、制度、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文字之中,是人们生活中最权威的行为模式,具有极其宽泛的内涵。

对于传统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去把握。从形式上看,传统具有延续性,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但并未保存下来的东西是不能称为传统的;传统具有群体性,传统是以往生活经验的历史结晶,是集体特质的集中体现,也是群体中最有权威的思维模式。此外,传统还具有潜意识性、群属认同性、可塑性等特征。从内容上看,传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价值观念系统,它是由对自然、社会、人以及历史的价值观念所组成的复杂整体。传统价值观念的固有的指向性,是传统的核心和深层结构。

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它在社会时空中延续和发展,既是过去的,又包含着现在,开拓着未来。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传统;同一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对传统的理解也不一样。对传统的解释与认同,总是同人们对历史的具体把握和所处时代的特点相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实质上是特定时代的人们对历史所做的特殊解释、选择与认同^[15]。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中国是一个历来给予政治以特殊关注的国家,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大体上是一种政治文化,政治性是其主要的属性。中国古代的历史,在旧史家笔下,就是一部政治史;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所谓“文以载道”的原则,是强调文化形态要“载道”,即承载一定的政治内容。对政治事务的普遍关心,是中国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孔、孟坐而论道,并不是体验和追求单纯的生活方式,而是对社会政治生活各个层面的观照;历代士人多以“治国平天下”作为最高理想,以仕途为人生唯一正途;很多中国人习惯上以政治尺度来评价善恶是非,以忠奸、好坏作为品评人物的最主要的标准。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识可以成为民族精神的主体。政治地位可能高于一切,政治权力可能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几乎可以向一切社会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梁漱溟说,中国政治之根本法则与伦理道德相结合,二者一致而不分^[16]。张岱年说,中国哲学合知行、一天人和同真善^[17]。王亚南认为,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风习与教育思想成为政治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一种配合物”^[18]。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政治文化就具有得天独厚的发育条件方面的优势,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宏大体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绵延流传、通古贯今。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各家各派都做出了贡献,其中以儒、墨、道、法四家的影响为大,不过,墨家的影响不出战国,其他三家的思想都在中国封建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儒、道、法三种思想传统相互作用,构成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儒家学说又是主体,且居于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儒家学说居于政治上的独尊地位。自西汉以后,社会选择了儒家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此以后,尽管在某些历史时期(如魏晋、隋唐时期)内,儒家思想曾经受到佛教、玄学的冲击,但是儒家的正统地位却没有在根本上动摇,真正成为政治上进身之阶的仍然是儒家经术。人们历来认为:“儒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9]

(2)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拥有最发达的传播手段。历史上,一种思想文化对于社会的影响的程度,往往决定于这种思想所拥有的传播手段。自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形成以后,儒家学者为了传授儒家思想,建立了早期的学校。秦王朝焚书坑儒,儒家思想却没有因此而断绝,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斯。自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在政治上获得成功,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建立了以传授儒家经书为主要目的的官府学校,此后,这种教育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府学校与私学是文化传播的最主要手段,而儒学又独占了这种传播途径,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校,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儒生,儒家思想的影响也随之日益加深。在清中叶以前,无论是社会上层的文人学士,还是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思维方式、社会观、道德观的影响。

(3)儒家思想吸收并同化了其他学派的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儒、道、法三家曾经有激烈论争的历史,但自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确立以后,这三种政治思想之间的斗争逐步退居次要位置,三者之间相互补充、互相融合、互相吸收则日益显著。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之间的相互补充主要表现为封建国家内行刑罚、外施仁义。儒道两家的相互吸收和影响,表现为儒家对于道家思想的吸收和道家对儒家传统的日益接近。在儒学的影响下,魏晋以后的新道家接受了儒家的经学方法,用儒生注解经传的方式去注解老庄。儒道在思维方式上的接近,导致了思想内容的接近。儒家从道家思想中吸收了无为政治的思想成分,而道家则接受了儒家的社会观,对于道家传统进行修正。在吸收和融会各派学说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规定性和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构性,以其一整套范畴体系将中国社会结构理论化、符号化,并且一直参与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塑造。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核渗透到广大民众的观念及行动之中,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大文化背景^[20]。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成并沿传下来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它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秦汉,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沿袭、发展,近代开始衰微,但这一过程始终是一种文化范式的延续。由于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地理的等多方面原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其固有的特征。

(1)以“仁”与“礼”结合为本体的伦理政治观

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是以“仁”与“礼”结合为本体的,它适应了中国古代伦理型社会

的需要。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伦理政治观,不仅包含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它本身就是政治实践的最高原则。因此可以说,建立在以“仁”与“礼”结合为本体的政治哲学基础上的伦理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

伦理政治观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有着极为特殊的作用。伦理政治观作为政治统治原则内含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作为政治统治手段是统治阶级调整政治与社会关系、控制国家的重要工具,从而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和保证。伦理政治观以孝、忠一体维系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关系,家国不分,或家国同构,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

(2)以王权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王权支配社会”,王权主义就是这种现实在政治文化中的反映。与“王权”相同的观念还有“君权”“皇权”等。所谓“王权主义”既不同于一般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传统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与这一结构相适应的观念体系^[21]。王权主义宣扬君权的至上、无限和全能,并在其整个运作过程中,直接促进、强化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通过多种社会化的渠道和方式,影响以至控制人们的政治观念意识。

与王权主义的存在和运作密切相关,形成如下的主要观念:君主能参天地,是调节人与自然的中枢,君主不但被圣化,而且也有神化的意味;君主是政治治乱的枢机和决定力量,君主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政治局面发生重大影响;君主享有崇高的地位,拥有统属社会一切的巨大权力;君主是认识的最高权威和终极裁决者,权力和认识本来是属于两种不同范畴的事,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确认君主的权威高于认识,也裁决认识。

(3)以“平权一大同”为内容的社会政治理想

中国古代民众的社会政治理想,始终没有离开物质生活的温饱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这个主题。

中国哲学,无论儒、道、佛,本质上都是一种人生哲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儒家虽然也强调社会的等级差异,要求各种身份的人都要恪守本分,但其学说中也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均衡,在一定意义上肯定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憧憬和向往“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这个被我们归结为“平权一大同”的社会政治理想,就是传统中国对理想社会的设计与构想,它主要包括:平权、民本思想与大同意识等。

(4)以传统经学为框架的政治思维方式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而各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决定着各自民族文化的发展路向和进程。自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定以后,经学的思维方式逐渐被人们认同和接受,而且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同时,经学也成为传统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工具。

以传统经学为框架的政治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尤其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注六经”“言必称圣贤”。于是,“崇圣尊经”成为国人不可移易的思维定式,“大一统”成为传统中国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上述特征在以后的相关内容中还将进行较为详尽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二、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政治文化结缘

在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复杂关系之前,有必要对本课题研究的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做一界定和说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鉴于从单纯的社会学方法、阶级分析法、政治决定论等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逻辑的把握,存在着诸多弊端,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构想,这一构想旨在将近代文学的后段和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合并,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给予重新估定。“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显示了宏阔、大气的学术视野,呈现出开放性、整体性的学术格局。但证之于历史本身,作为争议颇多、流布最广的文学史分期概念,不免有大而化之的宏观立论,不无某种“理想性假定”成分的存在,也无不残留着西方历史哲学衍生的印痕。在本课题研究中,我们之所以接受和使用这一分期概念,并不是撼动原有的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研究格局,也不认为它比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称谓优越和高明,而是因为就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演进过程来看,自在作为一个文学整体,它有着大致相似的复杂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背景,存在着许多相互的融通之点,显现着贯通性的文学内在规律。以“一百年”为历史跨度的中国文学的分期方式和研究格局,“20世纪中国文学”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后的论述中,笔者将这样理解并使用“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

建立在艺术本体论和艺术自足论基础上的文学史观,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有意地悬置20世纪中国文学生成的“社会历史语境”,“虚设一个绝对而空洞的意义尺度”,却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意义世界的“简化和平面化”,是对文学传统的丰富性的漠视^[22]。作为治史的立场、文学史观和方法论问题的价值评估体系的重构,试图以“吞纳力”“公正性”的姿态,包容异彩纷呈、繁杂多样的文学形态,书写或重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应该为文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展示出诱人的发展前景,但问题是新的价值评估体系在哪个价值层面上统合、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形式去处理这种“汇集”,又往往面临实际“操作性”困难。因为在百年文学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多层次的价值观、世界观的差异与冲突,这是基本的事实。如果刻意淡化、回避这种冲突,反而可能丧失把握历史和现实真实的契机^[23]。花样繁多的新的研究方法的广泛引入,也曾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但立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生态背景,着眼于特定时代复杂的文学创作实践,有时也不免存在一厢情愿的尴尬。

任何文学现象包括具体作家作品的生成,总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依据,总与一定时代的经济变革、政治意识、文化状况、社会忧患等等相联系,它与过去的历史传统总有承继关系,与未来的发展走向总有延续关系。

检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在“许多政治敏感时期,政治形势、政治文化往往是构成文学生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24],文学始终与政治意识、社会思潮的变化,与中国知识分子救国安邦的奋斗历程、报效民族国家的千秋情怀相一致,“文学被融入社会、国家、民族的知识谱系,表达有关社会、国家、民族和阶级的知识意义”^[25]。“前五四时期”^[26],文学自觉承担起推翻帝制的政治革命的重任,随之出现了 20 世纪最初的具有爱国主题与悲壮风格的政治文学。文学革命伴随着思想、政治启蒙的新文化运动而发生,它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潮难以完全剥离。五四时期曾提出的反对“文以载道”的思想尚未落到实处,有研究者所说的“反载道始,以载道终”(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导言》),不无偏激,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庄锡华说:“文学研究会中人反对文学载封建之道不遗余力,却并不反对载人生之道、革命之道。”^[27]谢冕也说:“中国新文学从 20 年代就开始一种倾斜的滑行。……其原因来自中国社会的实际处境:中国仍然如同往昔那样充满悲哀和苦难,内忧外患使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这处境逼迫文学回到原先的环境中去——这环境是由社会决定的。文学以外的原因要文学顺应它的要求,改变已有的流向。新文学面临的现实社会的质询,使新文学重新与中国传统中的文以载道思想接续起来。”^[28]文学“为人生”虽然与文学为“政治”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为人生”并不是一般文艺学强调人的生命状态或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而是直接指向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中国人的现实处境,关注他们的命运和前途。“为人生”的文学的倡导者突出文学反映社会、服务人生的重要作用,强调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文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文人们不是住在象牙塔里面的,他们乃是人世间的‘人物’,更较一般人深切地感到国家社会的苦痛与灾难的”^[29]。“为人生”其实就是“为现实”“为革命”,其政治化趋向是不言而喻的,这样,“为人生”的文学很快被早期的“革命文学”所代替。关心国家兴亡、民族崛起的强大的社会思潮和政治意识,压倒了一切,掩盖了一切,冲淡了一切。“文学始终是围绕着这中心环节而展开的,经常服务于它,服从于它,自身的个性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始终不过是对现实积极的或消极的一种抗议而不可能是纯艺术的追求,文学在精神激励方面有所得,在多样化方面则有所失”^[30]。大革命失败后,文学的政治化终成主潮。创造社成员迅速转向激进而主张“革命文学”,便是生动的例证。“我们的眼泪汇成新生命之流泉,我们的痛苦汇成分娩时之产痛”,“我们要如火山一样爆发,把一切的腐败的存在扫落尽,烧葬尽”^[31]。“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各个的细胞在为战斗的目的组织起来,文艺的工人应当担任一个分野。前进!你们